孙中山莅临浙江史事考述

张学继

【摘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多次莅临浙江,或游历,或考察,或者是部署革命行动,这不仅是浙江民国史上的大事,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重要史实。但是,在孙中山莅临浙江的问题上,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长期来说法不一,至今尚无比较明确一致的结论。本文对民初孙中山莅临浙江的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否定了一些不足为据的传说,明确肯定孙中山曾经于1912年12月、1916年8月、1916年9月、1917年7月、1919年上半年、1920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共6次莅临浙江,这是目前关于孙中山与浙江关系最明确的结论。

【关键词】:民国初年 孙中山 浙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莅临浙江,或游历,或考察,或者是部署革命行动,这不仅是浙江民国史上的大事,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重要史实。但是,在孙中山莅临浙江的问题上,学术界长期来说法不一,有必要加以再研究。

一、关于孙中山莅临浙江的次数问题

关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莅临浙江的次数问题,目前存在着“三次”、“四次”、“几度”、“多次”等不同的说法。

持“三次”说的,主要有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孙中山与浙江》一书,该书在“前言”中说:“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6年间曾三次来浙,在杭州、绍兴、宁波发表了五六次演说。”^①该书称孙中山分别于1912年12月、1916年8月及1916年9月三次来浙。浙江大学历史系杨树标教授也持“三次”说,但他所说的三次,在时间上与上述《孙中山与浙江》一书又有所不同。他说:孙先生第一次来浙江是在1912年11月8日。同年12月9日,第二次来浙访问,13日回沪。1916年8月6日,(第三次)来浙,在杭州逗留至20日;21日赴绍兴,作一次演讲;22日赴宁波,作一次演讲。^②

持“四次”说的主要有王维友、浙江省档案馆编研处、熊彤等。王维友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说孙中山曾四次到过浙江。四次的时间分别是:1912年11月8日,12月8日,1916年8月16日,1916年9月15日。^③署名浙江省档案馆编研处的《心系钱江——孙中山视察浙江》一文也持“四次”说,指出四次的时间分别为1912年11月,1912年12月,1916年8月,1916年9月。^④浙江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熊彤在《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说:“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⑤上述持四次说者,所指的时间都是一致的,都肯定是1912年、1916年各两次。

持“几度”或“多次”说的主要有李军、龚剑锋、李金见、庄临安等人。李军在《慷慨陈词,宣扬建国新方略——孙中山在浙江之演说》一文中说:“孙中山生前几度踏上浙江这片土地,凭吊革命英烈,宣扬三民主义及建国方略。”^⑥龚剑锋、李金见:《孙中山

^①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孙中山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杨树标:《孙中山与浙江改造——孙中山1912—1916年在浙江的六次演讲》,《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的开放思想与浙江的现代化建设》一文说：“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6年间多次来浙江，辗转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发表演讲，宣传革命，共谋民主大业。”^⑥“几度”、“多次”都是不确定的说法，没有学术价值，下面不再予以讨论。

笔者上面罗列了迄今为止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关于孙中山巡游浙江次数的主要说法。但是，根据笔者目前所查阅到的史料，上述“三次说”与“四次说”都是不准确的，留待下面再作具体的探讨。

二、几种不足为据的说法

笔者发现，在孙中山莅临浙江的问题上有若干不足为据的说法，有必要作简要分析。

（一）孙中山两次到访杭州西湖白云庵说

1945年，伯侨在《闲话西湖白云庵》文中称：“总理（指同盟会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引者注）也曾去过两次（白云庵），一次是民元前二年的九月，他到时正是晚半，带着一卫士，坐了小船，当晚在大刘庄过夜。第二天一早就走。第二次是民国二年四月，庵正中悬的‘明禅达义’的匾，就是第二次去时写的。”^⑦时隔30多年后，有人根据这位伯侨的说法加以演绎，写成文章称：“1910年秋，孙中山为联络各地革命力量，曾于九月间某晚，由日本到南洋经上海乘车秘密来杭州，他在涌金门乘游船到雷峰塔上岸，来到白云庵开会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悄悄地离开杭州。”^⑧

查孙中山的行程，孙中山1910年全年都在国外活动，并无回国的记录。如果孙中山真的冒很大风险从欧美跑到杭州西湖边的白云庵来，总要见几个重要的革命党人有所布置，不可能跑来什么事也不干。如果孙中山这个时候来杭州部署反清革命工作，那可是浙江辛亥革命史上的特别重大事件，那些曾经见到过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肯定会大书特书。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浙江革命党人提及此事，可见此事本来就是子虚乌有。至于伯侨说孙中山1913年4月访问第二次访问白云庵，也显然是搞错了时间。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⑨笔者以为，所谓孙中山二次、三次到白云庵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二）孙中山1912年11月来浙江说

孙中山1912年11月第一次来浙说流传很广，无论是持“三次”说，还是持“四次”说的，无一例外都肯定孙中山曾于1912年11月来过浙江。此说最早出自汪振国撰写的《孙中山杭州之行》一文，该文说：“中山先生曾三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是1912年11月，经安庆、芜湖，于（是）月之8日到杭，旋去上海，留杭时间很短。”^⑩应军与吕师煜合著的《吕公望传》称：“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杭州视察观光。……（1912年）11月8日，他经安庆、芜湖抵达杭州时，受到浙江都督朱瑞、陆军第六师师长吕公望的热烈欢迎。……因这次在杭逗留时间短促，随即回上海。”^⑪

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孙中山于1912年10月18日从上海乘坐“联鲸”号军舰西上，开启长江之旅。19日下午视察江阴炮台。20日，视察镇江炮台。21日上午视察南京幕府山炮台，下午5时抵达南京下关。22日下午离开南京继续西上，23日下午

^①王维友：《孙中山先生在浙江》，《今日浙江》2001年第18期。

^②浙江省档案馆编研处：《心系钱江——孙中山视察浙江》，《浙江档案》2010年第6期。

^③熊彤：《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李军：《慷慨陈词，宣扬建国新方略——孙中山在浙江之演说》，《浙江档案》2003年第8期。

^⑤龚剑锋、李金见：《孙中山的开放思想与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增刊，第211页。

^⑥张文伯主编：《中央周刊》第7卷第31期，1945年8月10日出版。

^⑦王维友：《中山先生浙江行》，《浙江日报》1981年10月8日。

^⑧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3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1490页。

午抵达安庆(当时的安徽省省会所在地)。24日上午离开安庆,24日上午抵达江西九江,当天下午2时离开九江前往南昌,25日晚抵达南昌,28日下午离开南昌,29日再次来到九江,当晚离开九江东下,30日抵达芜湖,31日回到上海。^⑤查孙中山此次长江之行全程都是乘坐军舰。安徽芜湖与浙江杭州之间并无水路连接,孙中山不可能乘坐军舰而来。况且,那时的安徽芜湖与杭州之间也没有公路、铁路联通,孙中山怎么可能从芜湖来杭州?难道你让孙中山徒步几百公里过来吗?再说,孙中山徒步几百公里跑过来,又不让他到杭州停留一下,又直接去了上海,这合情合理吗?再查《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记载的孙中山1912年11月的行程,孙中山11月8日前后都在上海,并无外出视察的记载。^⑥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以为,孙中山1912年11月来浙江之说是空穴来风。更重要的是,如果孙中山于11月来了浙江,那就不可能紧接着于12月再次来浙江,其道理显而易见。

(三)孙中山1913年7月秘密到绍兴说

陶维堉在《孙中山访问绍兴记》一文中写道:“中山先生于(1913年)7月20日前,乘轮从上海潜出,先到宁波,再来绍兴,宿于西咸欢河沿的西厅边洋房间中,侍卫长为陶广,亦(绍兴)陶堰人,主要是布置王金发进攻绍兴,和为革命筹款。曾召集部分同志在西厅开会,荫轩公当时捐助2000银元,先生即写收条,荫轩公曰:‘何必呢?’先生说:‘这样好留作纪念。’该收条在陶泰生布店结账时,族人共见。这时,觉民舞台即将落成,荫轩公请先生赐名。先生题‘觉民’二字,后经车眉子放大,镶成匾额。原以为落成之日,正是庆祝二次革命胜利之时,不幸王金发攻城失败,先生由伯初公送出绍兴,偕同王金发经宁波回上海。28日,中山先生离开上海,8月2日乘德国邮轮往香港转日本。”^⑦

笔者以为,陶维堉讲的这个故事明显不可靠。第一、从现有的各种文献资料来看,“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一直坐镇上海,指挥反袁斗争的全局,期间并无到宁波、绍兴的任何记载。况且,当时的浙江都督朱瑞表面上标榜“中立”,但事实上已经完全投靠了袁世凯,孙中山不可能轻易离开上海租界,冒险去宁波、绍兴等地活动。第二、上述回忆中说孙中山到绍兴主要是布置王金发进攻绍兴,此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关于王金发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行踪,《王金发传》写道:“二次革命”爆发后,“王金发在上海招集旧部奋起响应,出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命谢飞麟起草讨袁檄文,亲赴宁波策动驻军,以图响应,终因浙江都督朱瑞的阻挠反对而连遭挫折。‘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国事犯’悬赏通缉王金发。王金发蛰居上海,陷于困境。”^⑧由此可见,“二次革命”期间,王金发主要是以上海租界为根据地,进行反袁活动,期间一度到过宁波秘密策动旧部,但并没有回绍兴的记录,所谓孙中山到绍兴布置王金发进攻绍兴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第三、陶维堉文章中提到的陶广(1887—1951)是湖南醴陵县人,早年就读于江南讲武堂,毕业后先后在湘军统帅蔡锷、程潜、唐生智、何健等部任职。1926年在唐生智指挥下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克武昌城的战斗中立功升任师长。1936年随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入浙,抗战爆发后在浙江地区与日军作战,1951年在杭州去世。可见,陶广既不是绍兴陶堰人,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孙中山的侍卫长,更不可能在1913年7月间侍卫孙中山来绍兴。总之,陶伯初讲述的孙中山1913年7月到绍兴的故事不足为据。

(四)孙中山1916年8月到宁波奉化说

宁波奉化流传一种说法,即孙中山1916年9月22日至25日视察宁波期间,曾经专程到奉化。据说,在孙中山来浙之前,前沪军都督府军需官周淡游的母亲(一说是父亲)病故,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百忙之中从宁波赶到奉化吊唁。此说出自周淡游侄子周天声晚年的口述。^⑨

周天声讲的这个故事,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孙中山在宁波的三天时间,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不可能抽出一天的时间专门去奉化吊唁。第二、孙中山1916年8月巡游浙江既没有带卫队,也没有保镖,随行的只有胡汉民、戴季陶、邓家彦、冯自由、周佩箴

^⑤①《孙中山与浙江》(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②应军、吕师:《吕公望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③④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739-745、745-749页。

^⑤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集粹·政治(军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⑥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六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3669页。

等几位老部下。其中，戴季陶在游览杭州时染病住进了浙江医院治疗，孙中山等离开杭州去绍兴、宁波游历时，戴季陶并没有跟着去，留在了医院，戴季陶病愈后从杭州直接回了上海。孙中山一行去绍兴时，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特派省政府民政厅秘书陈去病陪同。所以，周天声所说的孙中山的警卫人员散在街上守卫的情景，不可能发生在孙中山这次巡游浙江期间。第三、如果孙中山去奉化，胡汉民等人肯定也要跟着去。以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如果真的到了奉化，周淡游居然不让他们进屋，这也太不合常理了，周淡游岂能如此怠慢胡汉民等贵客？第四、孙中山如果真的去了奉化吊唁，那也是一件大事，不仅报纸要报道，孙中山的随行人员也要记载，周淡游本人更要记载，根本轮不到周天声事隔几十年以后再来抛出这样的独家内幕新闻。笔者以为，周天声的回忆不足为据。

三、孙中山六次莅临浙江

在排除上述几种不足为据的说法以后，笔者断定，孙中山曾经六次莅临浙江大地，下面逐一介绍。

（一）第一次是1912年12月8日至12日

这一次，孙中山是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而来的，随同孙中山来的有陈其美（前任沪军都督、工商部总长）、姚勇忱（国民党驻沪机关部部长兼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王文典（中国社会党成员、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会长）、吴飞如（孙中山英文秘书）、刘民畏（上海《中华民报》主笔）及陈惠生、钱振椿等，孙中山一行于12月8日上午10时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杭州，途径松江、嘉兴及海宁县的海宁县硖石、斜桥等车站时均作了停留，接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孙中山一行在嘉兴车站下车后，国民党浙江支部负责人褚辅成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孙中山向欢迎者发表了演讲，并在褚辅成陪同下游览了南湖烟雨楼，在狮子峰前合影留念。随后，褚辅成加入陪同者行列，陪同孙中山前往杭州。^①下午2时40分，火车抵达杭州艮山门车站，浙江都督朱瑞率领浙江文武官员及士绅在此迎接，然后送孙中山到梅花碑行台小息。下午4时，孙中山到杭州马坡巷浙江法政学校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①

12月9日上午9时，孙中山出城到西湖孤山祭奠浙江辛亥革命先烈，到“秋社”参加秋瑾烈士追悼会，并应允担任秋社名誉社长。回到上海后又写了挽秋瑾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②随后，孙中山一行游览了三潭印月等名胜。上午10时半，在孤山公园（今中山公园），浙江都督朱瑞介绍浙江军政各界领袖及社会名流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随即发表演说，强调注重整理财政，发展工商，而以钱币革命作为入手办法。^③11时40分，朱瑞在楼外楼公宴孙中山一行。宴会结束后，朱瑞陪侍孙中山合照一张，并一同参观文澜阁藏书楼。下午4时30分，孙中山出席浙江51个团体在杭州国民公所召开的特别欢迎大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④

12月10日晨，孙中山一行在浙江省民政司长屈映光等人陪同下，赴江干察看铁路，顺道登吴山景区，与同行者合影一张。随后，孙中山一行乘坐肩舆前往美国教会创办的之江学校参观，在之江学校师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学生求学首先要立志，要自觉成为“后日左右民国之人”。会后与全校师生约200人在赛佛抡堂（即慎思堂）前合影，并由校长王令赓（音译为“玛托克斯”）牧师特备午餐宴请。学校赶制了“欢迎”的横幅，并在赛佛抡堂正门和正门阳台上悬挂3面五色国旗。^⑤下午，孙中山一行在闸口乘火车赴拱宸桥商埠参观商场。接着，孙中山一行出席佛教总会浙江分会的欢迎会，并摄影纪念。之后，孙中山一行又出席了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浙江支部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政党之间的竞争应当合乎道德，以道德为前提。所有政策，一秉公理。^⑥

12月11日，孙中山一行游览天竺、灵隐诸名胜。当时陪同的褚辅成1929年在《题国民党浙江支部开会欢迎孙总理莅杭摄影照》上写道：“民元初冬，总理偕陈英士同志来游西湖，国民党浙江支部开会欢迎。礼成，摄影。……斯时，总理精神矍铄，体质甚健。一日，游灵隐，徒步登韬光，更上北高峰，举步如飞，从者望尘莫及。强健若此，宜享遐龄……”^⑦这一天，孙中山一行还特意赴清末浙江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西湖白云庵，看望当家和尚得山（智亮）与徒弟意周，一起合影留念，并亲笔题书“明禅达义”匾额。^⑧12

^①王舜祁：《中山先生在奉化》，《孙中山与宁波》，民革宁波市委，2016年，第64-65页。

^②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34页。

月12日上午,孙中山一行离开杭州返回上海。孙中山第一次浙江行前后共计五天。

(二)第二次是1916年8月16日至26日

8月12日,孙中山接受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的邀请,决定前往浙江巡游。但因夫人宋庆龄女士身体欠佳,推迟到16日才启程。当天早晨八点,孙中山与胡汉民、邓家彦、冯自由、戴季陶、但焘、周佩箴等登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当天上午抵达杭州火车站。孙中山等下车,与在车站迎接的浙江军政各界人士见面,随即乘坐肩舆前往杭州新市场清泰第二旅馆休息。当天下午,孙中山一行游览西湖,并再次到西泠桥秋瑾墓凭吊。并充满感情地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⑤17日早晨,吕公望着便衣到旅馆谒见孙中山,旋因公事离去。随后,孙中山一行继续前往西湖游览,登葛岭至初阳台。中午,吕公望在浙江督军公署宴请孙中山一行,浙江各界70余人出席作陪。

应吕公望的请求,孙中山即席发表演讲,讲述道路交通建设的重要性。他勉励浙江当局首先致力于道路交通建设,然后发展工艺,把浙江建设成各省的模范。^①下午3时,宴会结束,孙中山一行离开督军公署,前往六和塔观赏钱塘江潮,并命浙江省民政厅秘书陈去病赋诗记盛。从六和塔下来,孙中山一行又到著名的虎跑寺品泉水。^②18日上午,孙中山一行拜谒了明末清初抗清英雄张苍水墓,说:“张公乃吾人之先觉者。”^③然后前往石屋洞景区,观赏历代石刻造像。^④下午3时,浙江省议会开会欢迎孙中山一行。省议会副议长张翘宣读了热情洋溢的颂词,并说:“孙先生再来浙江,实与吾浙以最大之光荣。”^⑤孙中山随即登台致谢,并发表演讲,讲述地方自治、平均税则等问题,历时近两小时。孙中山演讲结束后,随行的胡汉民也发表了演讲。^⑥演讲结束后,孙中山一行前往杭州陆军同胞社出席宴会,即席发表演讲,阐述五权分立理论,指出五权分立可以西方补救三权分立的弊端。^⑦

19日上午,孙中山一行除戴季陶因病留杭治疗外,其余由陈去病陪同离开杭州,乘肩舆过钱塘江,前往绍兴。傍晚抵达绍兴,受到绍兴县知事宋承家以下官绅的迎接,下榻于绍兴布业会馆旁的适庐。20日上午10时,在布业会馆会见绍兴县各界人士,然后前往布业会馆的党民舞台参加欢迎会。商会董高云卿在欢迎词中说:“吾国专制流毒,已数千年。先生一人,效华盛顿之所为,推翻君主,创设共和,使吾人得享共和幸福,皆先生奔走呼号之力。先生近日来绍,吾人当竭诚欢迎。”^⑧孙中山起身致谢,并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必须合群力,而后可成世界最强盛之国。”^⑨演讲结束后,孙中山接见并慰问了辛亥革命功臣陶成章的父亲陶正。下午,孙中山一行游览了绍兴城内的贡院、大通学堂、徐锡麟祠、陶成章女校等,随后乘船前往大禹陵参观。8月21日上午,绍兴县知事宋承家陪同孙中山一行游览陆游快阁、王羲之兰亭等名胜,中午在曲水流觞宴请孙中山一行。下午,孙中山一行到绍兴东湖拜谒陶成章祠,并题写“气壮山河”横额。

21日晚餐后,乘船离开绍兴前往宁波,夜行八十里抵达曹娥江,渡江后乘火车前往宁波。22日上午11时,抵达宁波火车站,鄞县知事祝某等官绅到车站迎接,并安排孙中山一行下榻呦呦旅馆,中午,祝知事在旅馆设宴招待孙中山一行。下午2时,在宁波第四中学礼堂开欢迎会,祝知事宣布开会后,各界代表王东园致欢迎词,之后,孙中山、胡汉民相继演说。2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由祝知事陪同参观竹洲女子师范学校,随后登上天封塔眺望四明形胜。中午,宁波各界人士在后乐园宴请孙中山一行。下午,孙中山一行参观江北工业学校及公立工厂等。

^①《孙中山莅杭纪事》,上海《申报》1912年12月10日。

^②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5卷,第53页。

^③《西湖公宴孙中山纪事》,上海《申报》1912年12月11日。

^{④⑥}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97、200页。

^⑤杭州大学校史编写组:《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页。周懋公:《孙中山莅之江学校记》,《通问报》第530回,1912年12月。

^⑦王天松编:《褚辅成文存摭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⑧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第178页。

^⑨《孙中山先生游杭记》,上海《申报》1916年8月19日“要闻”。

23日晚,孙中山一行乘坐海军建康舰前往象山港考察。24日上午,孙中山下军舰,乘坐小艇考察象山港。25日下午,孙中山一行乘坐建康舰抵达普陀山上岸,游览普陀山名胜及寺庙。当晚7时,普陀山僧人宴请孙中山一行。26日,孙中山一行乘坐建康舰从普陀山出发,下午四时抵达上海吴淞口,下船后乘淞沪火车进城。

孙中山第二次浙江行历时10天,先后游历了杭州、绍兴、宁波、象山、舟山等地,是他历次浙江行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三)第三次是1916年9月15日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应海宁知名人士许祖谦(字行彬)等人的邀请到海宁观赏著名的钱江潮。随行的有夫人宋庆龄以及张静江等7人,海宁籍的浙江省议会议员许祖谦、任茂梧、吴鸿逵等事先回到海宁准备迎接并担任向导。^⑥孙中山、宋庆龄一行从上海乘坐9月15日的早班火车赴海宁,在海宁周王庙车站下车,改坐肩舆前往海宁县城,海宁县知事刘蔚仁出城迎接孙中山一行到海宁乙种商业学校休息并吃午饭。吃了中饭后,孙中山一行乘坐肩舆前往钱塘江边新修建的“三到亭”准备观潮。下午两点,“潮势大作,如万马奔腾,顾而乐之,大有观止之欢。”^⑦潮落后,孙中山与张静江等随行成员以及刘知事等海宁当地官绅等在三到亭摄影留念。^⑧宋庆龄没有参加摄影。随后,孙中山一行离开海宁于当天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孙中山为海宁乙种商业学校题词:“猛进如潮”。^⑨

(四)第四次是1917年7月4日

1917年7月1日,“辫子军”统帅张勋与康有为等复辟派宣布拥戴前清废帝溥仪复辟,将中华民国6年7月1日改为“大清帝国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复辟丑剧发生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开展了激烈的较量。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集章太炎、唐绍仪、汪精卫、孙洪伊、海军部总长程璧光、海军总司令萨镇冰、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开会商量对策。孙中山鉴于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在张勋的武力威胁下避居日本驻华公使馆,主张在上海设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本人担任临时大总统。这个提议遭到唐绍仪等人的反对,未能通过。

会议决定,在上海设立陆海军总机关,派军舰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南下行使总统职权。^⑩7月4日,孙中山乘坐海军应瑞舰前往浙江舟山,与浙江宁(波)台(州)镇守使顾乃斌举行秘密会谈。顾乃斌是老同盟会员,曾任同盟会浙江支部负责人。浙江光复后,一直是浙军重要将领之一,此时正担任宁台镇守使,手中握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

孙中山希望顾乃斌与中华革命党合作,公开宣布讨伐张勋复辟,并以舟山作为中华革命党的根据地。但此时的浙江督军是皖系军阀杨善德,浙江处于皖系军阀控制之下,顾乃斌自己兵力有限,对于孙中山的建议顾虑重重,不敢贸然答应。孙中山便于当天乘军舰离开舟山返回上海。^⑪孙中山赴舟山,本来是一次秘密行动,但还是很快被政敌掌握了。研究系的张君勱(字嘉森)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1917年)7月4日,中山先生乘应瑞军舰至舟山,谋与宁台镇守使顾乃斌据舟山,与顾谋不协,旋返上海。”^⑫

本来,宁台镇守使的衙门设在台州的海门,顾乃斌在没有请示批准的情况下跑到舟山去秘密会见孙中山,消息又被传出,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顾乃斌为了掩饰自己的行动,特于7月9日在上海《申报》发表《顾使因病请假》的消息称:“宁台镇守使顾乃斌本驻扎台州海门,前以张(勋)、康(有为)诸逆谋为复辟,以甬东为浙东门户,恐有宵小乘机扰乱,特自海门赴甬会同诸长官,商议地方防备各事。现在布置妥帖,人心亦安。唯顾使以炎天奔走,忽染热病,须事医诊。闻已电(浙江)督(军)署请假数日,一俟痊愈,即回海门防次。”^⑬

^⑥①《浙督军欢宴孙中山》,上海《申报》1916年8月19日“要闻二”。

^②③④⑦⑧⑨《孙中山先生游杭记》,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20日“要闻”。

^⑤⑥《孙中山先生在杭演说记》,上海《新闻报》1916年8月20日“紧要新闻”。

^⑩《杭州通信》,上海《申报》1916年9月17日。

(五)第五次是1919年上半年的某一天

关于孙中山第五次浙江行,目前只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一段回忆。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辰之际写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中说:“我自己记得,他(指孙中山——引者注)只要有一点空,就在书房里把大地图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深色铅笔和橡皮,在上面标绘出铁路、河道、海港等等。他订阅了一种英国出版的航运年鉴,知道很多关于船只吨位、吃水等这一类的事情。有一次,他乘巡洋舰视察海宁时,告诉大副,航道水浅,把船靠外行驶。但这位大副自以为他更熟悉情况,结果船搁了浅。”^{⑥7}宋庆龄的文章没有交代这次视察的年月日,笔者根据孙中山的行踪判断,这次视察浙江杭州湾应该发生在1919年的某一天。

笔者的推断如下:孙中山1917年7月6日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9月1日,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第一次开府广州,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对抗地位。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后,遭到西南军阀(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军阀)以及政学系政客抵制与拆台,孙中山政令不行,被迫于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

随后,西南军阀与政学系政客等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降为七总裁之一,随后又推举老官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5月21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取道日本,于1918年6月26日抵达上海,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到上海后,衡量利弊,宣布接受广州军政府总裁(七总裁之一)职务,同时派徐谦作为自己的代表常驻广州参与军政府政务。

从1918年6月26日起,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半,一直到1920年11月25日离开上海第二次前往广州建立军政府为止。孙中山到上海后,向外界表示:“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①在上海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孙中山在密切关注国内国际政治局势演变的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理论著述,先后完成《建国方略》之一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又名《心理建设》)及《建国方略》之二的《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本理论著作。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的计划。他主张在直隶湾(即渤海湾)建立不封冻的深水大港,具体位置应该是青河、滦河之间。^②关于东方大港,孙中山主张在现有“全中国最大之商港”上海之外,另建一个新的东方大港。

这个大港“最良之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③关于南方大港,孙中山认为当然是广州港。他说:“广州不仅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④据学者研究,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本是用英语写的,1919年初,孙中山将《实业计划》开篇总论分寄给一些西方的国家的政府及有关人士(包括政府要员、记者等),征求他们的意见。中文译本最早发表在1919年3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6月,将《实业计划》第一计划发表于上海英文杂志《远东时报》(TheFarEasternReview)第15卷第6期。8月,又将全书内容译成汇中文,以《建国方略之一——发展实业计划》为题,在上海《建设杂志》创刊号开始连载。1920年夏,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全书英文本。1921年10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中文全译本。^⑤

由此可见,宋庆龄文章中提到的孙中山“乘巡洋舰视察海宁”,很显然是孙中山从上海港乘坐军舰出发考察杭州湾的一次重要行动,目的是实地勘探以便确定东方大港的最佳位置。上面提到孙中山于1919年初将《实业计划》的总论寄给西方政治家与名

^{①②}《孙中山海宁观潮记》,上海《新闻报》1916年9月17日。

^③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22页。

^④《上海反对复辟之大计划》,《时报》1917年7月5日“本埠新闻”。《外报之记载》,《中华新报》1917年7月5日“本埠新闻”。

^⑤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下册(增订本),第760页。

^⑥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75页。

^⑦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3年,第2072页。

^⑧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流征求意见,孙中山在总论后说:“如(西方)资本团以吾说为然,吾更当继此有所详说。”⁸⁶据此可知,孙中山《实业计划》全书主要内容是在1919年上半年完成的。那么,笔者有理由断定,孙中山乘巡洋舰视察杭州湾的时间应该在1919年上半年的某一天。至于具体的时间,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材料。

(六)第六次应是1920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

有关孙中山第六次浙江行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孙中山的卫士马湘写的一段回忆,他写道:“有一次,先生(指孙中山)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谋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色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睛,以免惹人注意。

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三人时前时后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谋之的别墅‘李庄’(据杭州文史专家仲向平先生介绍,李庄与刘学询的刘庄毗邻,1949年后并入大刘庄——引者注),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仔!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十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并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三天,才回上海。”^①

马湘的回忆录同样有一个重大遗漏,就是没有交代这次杭州行的具体时间,年月日都没有。除了马湘写的回忆文字,孙中山一行还在西湖著名景点花港观鱼——九曲桥上留下了一张十分清晰的合影照片,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全部都在这张合影照片上,但这张照片同样也没有标注时间。多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孙中山、宋庆龄等在西湖九曲桥上的这张合影照片拍摄的时间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大致有1916年8月说^②、1919年4月说^③、1920年春季说^④、1920年秋季说^⑤、1920年11月22日前说^⑥。学者对孙中山此次杭州之行的时间有5种不同的判断,但正确的判断只能有1种。那么,那个判断究竟是正确的呢?

首先,1916年8月说可以排除。因为1916年8月随孙中山来杭州的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与照片上的人物根本对不上号。其次,照片上的人物都着春秋季节的服装,也不是1916年8月炎热天气所应有的着装。

1920年4月2日,孙中山在致张佐丞等人的电报中说:“近来段(祺瑞)派大有觉悟,已与我党(指国民党——引者注)调解,愿归和好。”^⑦此时,双方还只是表达和好的原望。可见,1919年4月说也是不正确的。那时,孙中山与段祺瑞的皖系仍处于对抗状态,孙中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杭州与段祺瑞的嫡系干将卢永祥见面。

我们还可以从孙中山杭州之行的陪同者之一的黄大伟的行踪来推论一下具体的时间。1920年5月18日,孙中山在《批朱和函》上批示:“子荫(黄大伟字)已回沪。”^⑧可见,黄大伟是5月中旬从广东回到上海的,从此开始,到7月上旬孙中山任命黄大伟为

⁸⁶①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7页。

②③④⑤⑥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110、140、13、97页。

⁹①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124页。

②持此说的主要有: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该书第180图),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纪念宋庆龄同志》(该书第14图),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该书第270页下图)等书均注明照片摄于1916年8月。现在可以肯定,这个时间完全是错误的。

③持此说的主要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先生画册》(该书第449图),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该书第560图),1996年台北“国父纪念馆”编辑出版的《国父革命史画》(该书第181页下图),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辑、团结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孙中山画传》(该书第213页下图),徐涛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上海》(该书第3页)

④持此说的有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后辛亥时代的孙中山与广州》(该书第67页下图)。

⑤持此说的有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一书。

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为止，黄大伟一直都在上海。黄大伟陪孙中山到杭州应当在此期间。由此可以排除孙中山一行1920年5月以前到杭州的可能性。

另外，1922年4月20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该报道说：“吾友云，当时政学系据有西南多数之地盘，乃假国民系占有议院多数之分子召集非常国会，成立临时政府，于护法主义之下，故合政学、国民两系治为一炉，以定七总裁之合议制，以政（学）系岑春煊为首席，而（国）民系之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亦各占其一。

厥后，南北和平会议，政（学）系依势擅权，蔑视同志，始则有私通北庭之嫌疑，继竟拟变更护法之宗旨，故孙（中山）、唐（绍仪）相继去职。北庭一面坚持保留非法元首之地位，一面收买旧议会中不良分子，安置于经济调查局，为釜底抽薪之计，嗣为舆论所不容，而权利地盘亦彼此争执，分配不均，双方俱无诚意，和议遂至中止。从此，唐绍仪自和议代表卸职后，即不问政事。中山亦逗留沪滨，再待机会。适段（祺瑞）系之王揖唐重谋第二次和议来沪，知西南护法主张之症结所在，颇收揽国民党分子欲与国民系携手，以图大局上根本之解决。事为徐东海（大总统徐世昌——引者注）所闻，深知于己之地位不利，其怨恨段系之深，亦与今日致怨于奉张（作霖）与老梁（士诒）相若也。

时岑（春煊）主席为徐（世昌）之高等顾问，北庭月汇薪费两千元至粤，而陆总裁荣廷亦拜北庭两粤巡阅使之命，政（学）系实为徐（世昌）所利用，徐（世昌）乃授意政（学）系袭取段系督军张敬尧所辖之湘省，又指使吴学究（佩孚）由湘让防北归，遂至湘省为西南所得，引起直皖战事。至内幕中实徐（世昌）段（祺瑞）交恶所由来也，其结果反促孙（中山）段（祺瑞）联合之进步。段系既已为徐（世昌）所算，王揖唐欲归不得，即自为孙（中山）、段（祺瑞）修好之媒介，而段系各督军，如浙卢（永祥）、闽李（厚基）等，鉴于湘张（敬尧）覆辙，人人自危，当然与王（揖唐）步趋一致。

故（孙）中山假游（西）湖为名赴杭，备受浙卢欢迎，此即孙（中山）、段（祺瑞）联合最初之表示。嗣即在杭（州）互订条件，其入手办法，即助孙（中山）返粤，依护法主张而谋统一大局。时陈炯明所部，方在闽粤交界之潮汕一带，与中山本属老同志，虽有助孙（中山）之心，但性素恃重，非计出万全，不肯轻动。当议定由闽李（厚基）济陈（炯明）饷械，保孙（中山）入粤，闽界各地，由李（厚基）接防。”^⑥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次来杭州，名义上是游览西湖，实际上负有与段祺瑞皖系集团的骨干、浙江督军卢永祥洽谈合作条件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任务。1920年5月下旬，吴佩孚擅自撤军北上，^⑦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公开决裂，加速了段祺瑞皖系与孙中山联合的步伐，这才有了孙中山杭州之行，孙中山与卢永祥秘密商谈合作条件。

1920年6月20日，廖仲恺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顷得先生电，知己电北京转催李督即拨子弹，但未悉能否有效。仲元赴闽交涉，所有作战计划及接防事宜，皆如李所要求，载书而往。”^⑧廖仲恺电报中的“李督”即福建督军李厚基，他与浙江督军卢永祥都属于段祺瑞的皖系。“仲元”是孙中山的亲信邓铿，他奉孙中山之命前往福建与李厚基联络。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这时皖系与孙中山的合作已经进入了实际进行阶段。笔者以为，孙中山杭州之行可以肯定是在1920年5月下旬或者6月上旬。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曾经6次莅临浙江。其中，前两次是应浙江省军政当局的邀请，公开视察浙江。第三次是应海宁地方人士邀请到海宁观潮，属于游历性质。第四次属于私人科学考察性质。第五、六两次属于非公开的秘密政治活动。除广东、上

^⑥持此说的有尚明轩主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卷（1893—1948）。

^{⑦⑧}《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3年，第246、263页。

^{⑩①}《北伐中孙陈一致观》，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4月20日。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吴佩孚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档案杂志社2009年印。

^③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65页。

海之外,浙江是孙中山巡游次数最多的一个省份,这也表明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无数的浙江志士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贡献卓著,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与他们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与感情;另一方面,浙江这块土地在孙中山心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孙中山在浙江期间多次发表演讲与谈话,对浙江革命志士、浙江人民以及浙江这块热土给与高度的评价与期许。至今,距孙中山最后一次莅临浙江已经过去了将近 100 年。今天,浙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设想与期许大多已经成为现实,这是可以告慰这位历史伟人的。

(作者 张学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杭州 310013)